

国际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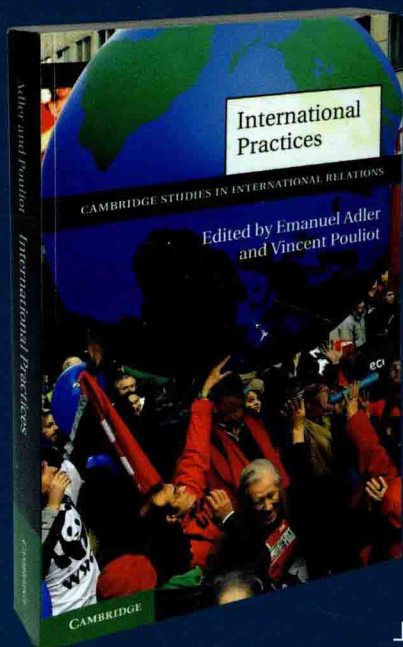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EDITED BY EMANUEL ADLER VINCENT POULIOT

[加拿大] 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 主编

秦亚青 孙吉胜 魏玲 等译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来自不同传统的 18 位优秀学者的跨范式理论对话，实践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跨学科前沿视角。

实践理论，在知识论层面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秦亚青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国际实践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EDITED BY EMANUEL ADLER VINCENT POULIOT

[加拿大] 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 主编

秦亚青 孙吉胜 魏玲 等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实践/(加)阿德勒(Adler, E.), (加)波略特(Pouliot, V.)著;秦亚青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SBN 978-7-208-13284-9

I. ①国… II. ①阿… ②波… ③秦…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5317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国际实践

[加拿大]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 主编

秦亚青 孙吉胜 魏玲 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5 插页 4 字数 373,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284-9/D·2730

定价 65.00 元

各章作者简介

丽塔·亚伯拉罕森(Rita Abrahamsen),渥太华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研究生院副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学院副教授。

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安德里亚和查尔斯·布隆夫曼以色列研究主任。

贾尼丝·彼埃里·马特恩(Jannice Bially Mattern),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尤塔·布伦尼(Jutta Brunnée),多伦多大学法学教授,环境法梅特卡夫主任。

阿琼·乔杜里(Arjun Chowdhur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Duvall),明尼苏达大学莫斯校友教授,政治学系主任。

莱娜·汉森(Lene Hansen),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政治社会学系国际关系教授,庆熙大学首尔分校国际学者。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政治及国际关系学院名誉教授。

帕特里克·M.摩根(Patrick M.Morgan),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系教授,全球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蒂尔尼主任。

艾弗·诺伊曼(Iver B.Neumann),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研究部主任。

文森特·波略特(Vincent Pouliot),麦吉尔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国

■ 国际实践

际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M.Ripsman),康卡迪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奥利·雅各布·森丁(Ole Jacob Sending),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治理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贾尼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冲突管理贝尔茨伯格教授,蒙克全球事务学院院长。

斯蒂芬·图普(Stephen J.Toope),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兼副教务长。

埃里克·沃滕(Eric Voeten),乔治敦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学院、政府系世界事务中心地缘政治与司法彼得·F.克罗伊副教授。

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C.Williams),渥太华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研究生院教授。

目 录

第一部分 国际关系与社会理论中的实践

第一章 国际实践：导论与理论框架

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 /3

第二章 理解“国际实践”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 /42

第二部分 实践与实践背景

第三章 国际关系的情感实践理论

贾尼丝·彼埃里·马特恩 /73

第四章 将背景知识推向“前台”：关于“神圣领域” 中适当性实践的对话

贾尼丝·格罗斯·斯坦 /100

第五章 互动国际法和法律性实践

尤塔·布伦尼 斯蒂芬·图普 /124

第三部分 实践的演进

第六章 威慑实践

帕特里克·M.摩根 /157

第七章 英国应对西班牙内战：重视实践因素及其对英国学派的启示

理查德·利特尔 /194

第八章 国内实践和均势：将实践整合于新古典现实主义

诺林·里普斯曼 /220

第四部分

实践中的实践

第九章 依托权力：国际组织的某些实践是如何主导其他实践的

奥利·雅各布·森丁 艾弗·诺伊曼 /253

第十章 政治运作实践

埃里克·沃滕 /281

第十一章 实施实践：穆罕默德漫画危机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莱娜·汉森 /307

第十二章 私有化实践：全球安全领域的权力和资本

丽塔·亚伯拉罕森 迈克尔·威廉斯 /339

第五部分

结论

第十三章 理论与实践

雷蒙德·杜瓦尔 阿琼·乔杜里 /365

第一部分

国际关系与社会理论中的实践

第一章

国际实践：导论与理论框架

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

我们邀请国际关系学者从多种实践的视角探讨世界政治,形成了本书的内容。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实践者的所作所为,因之能够聚焦国际事务的日常活动,包括多边外交、金融贸易、环境谈判等不同领域。我们分析了国际事务的诸多发展,综合起来就是世界的“整体图景”。对于这种整体图景,不同理论有着不同的表述。实践自然是国际关系领域长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我们借鉴社会理论研究新近出现的“实践转向”¹,提出了一个跨范式的研究议程,并且将其系统化,这就是将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competent performances)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切入点。这并不是说实践理论是普适性的元理论,也不是说实践是一切社会事物本体的统

* 我感谢以下人士:史蒂文·伯恩斯坦(Steven Bernstein)、莱拉克·吉拉迪(Lilach Gilady)、莱娜·汉森(Lene Hansen)、马修·霍夫曼(Matthew Hoffmann)、马库斯·科恩普罗布斯特(Markus Kornprobst)、弗雷德里克·梅朗(Frédéric Mérand)、艾弗·诺伊曼(Iver Neumann)、奥利·雅各布·森丁(Ole Jacob Sending)、温迪·王(Wendy Wong)、鲁宾·扎伊欧帝(Ruben Zaiotti)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人。他们对本章先前的稿件作出了十分有用的评论。参加多伦多研讨会的学者也对本章如何改进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感谢以下单位的资助: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理事会、多伦多大学康诺特(Connaught)基金会、芒克(Munk)全球事务学院、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尤其是路易斯·保利(Louis Pauly)和蒂娜·拉戈波罗斯(Tina Lagopoulos)]、人文与科学学院[尤其是梅里克·格特勒(Meric Gertler)院长]。还要感谢麦吉尔(McGill)大学和蒙特利尔大学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最后,我们也要感谢弗吉尼亚·迪盖塔诺(Virginia DiGaetano)和詹姆斯·麦基(James McKee)对研究提供的帮助;感谢帕特里夏·格雷夫(Patricia Greve),她对本书出版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作出过无法替代的贡献。

合。我们希望阐明的是,认真对待国际实践可以厘清世界政治的诸多方面,包括实际运作中的权力和安全、贸易金融、战略、制度和组织、资源、知识和话语等等,同时将这一切视为在世界上发生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行动。

国际实践研究近年来取得重要的进展。在国际关系学科,首先重视实践问题的是后结构主义者。他们传承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将世界政治重新定义为一组文本性实践活动。²后结构主义者给国际关系带来的一个重要启迪是: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是由无数日常的实践构成的,而这些日常实践活动往往被学术研究所忽视。³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受到像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这样的优秀社会理论学家的影响,开始将实践活动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⁴建构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对“行动”⁵和“实践理性”⁶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学术兴趣,这也有助于将国际实践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践转向是在世纪之交才出现的,当时,艾弗·诺伊曼(Iver B. Neumann)借鉴社会理论实践转向这一知识运动,提出“让实践回归语言转向”的观点。⁷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迅速加入这一行列。⁸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国际关系领域完全忽视了国际实践问题。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没有什么内容是神秘的、是某种理论范式的专利。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之中,实践问题受到了至少是间接的关注,尽管这些关注并不一定全都是有意为之。例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传统现实主义者将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外交或是均势战略等实践活动上面。⁹同样,英国学派所称的“国际社会的制度”,亦即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说的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管理、战争,也很接近我们重点讨论的社会性组织活动和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¹⁰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说明,在理性主义阵营中,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讨价还价理论已经富有成效地讨论了实践理论框架中的许多核心内容。¹¹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重要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分析货币与环境问题时要探索的实际上就是合作实践的方式,当然,这样说也许会略显牵强。¹²总而言之,实践是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一观点已经得

到含蓄的认可，所以，现在条件已经成熟，是对国际实践进行系统的、自觉的、具有理论内涵的认真研究的时候了。

本书希望表明，对国际实践的研究近年来获得了动力，这就为跨越范式鸿沟并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机遇。我们认为，无论一个学者具体的理论视角是什么，一旦开始审视实践活动，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忽视结构(或是施动者)、理念(或是物质)、理性(或是实践性)、稳定(或是变化)这些概念，因为人们必须在本体论上面超越传统的层次分析或是分析单位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不会有单一的实践理论，而是会出现多种研究实践的理论。事实上，国际关系领域实践取向的理论方式是由相当多的分析框架组成的，这些分析框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实践作为研究世界政治的核心切入点。正因为如此，国际实践的概念才能够为实现范式间对话提供特别丰厚的土壤。我们认为，国际实践的概念可以使不同范式相互促进，而不是使这些范式相互竞争、相互取代、相互兼并，甚至相互抵消。范式之间的相互促进才是社会科学进步的原动力。

我们在导论部分指出，突出国际实践会在四个方面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第一，如果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重点是实践，那么就会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活动或是有着更好的理解，或是有着不同的理解。换言之，世界政治可以被理解为由实践活动构成，这些实践活动赋予国际行动以意义，使得战略互动成为可能；同时，实践活动又是通过国际行动和互动而发生、变化并得以加强的。将实践设为重点有助于拓宽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范畴，为新的研究议程奠定基础，围绕这样的议程可以就国际关系理论展开论争。实践也可以作为分析单位，以超越传统的“分析层次”方法。第二，实践概念是一个中心点，可以使跨范式对话成为可能。我们认为，对话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使不同学派的学者得以展开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我们对实践的定义有很大的灵活度，足以容纳诸多不同的观点。第三，实践取向的方式可以避免社会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存在的诸多二元对立现象。我们表明，实践概念跨越了稳定与变化、施动者与结构、理念与物质之间的分野，这就为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相互促进提供了新的机会。第四，将实践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开拓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创新性研究议程。我们将表明，我们提出的这个分析框架重新梳理了国际关

系学科的核心概念,包括权力、历史、战略等等。根据以国际实践为核心的研究议程,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问题。为了形成跨范式对话,我们在导论部分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核心是实践是变化的动力。我们将实践既视为解释因素(explanans),也视为被解释因素(explanandum),梳理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有组织行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的多种方式。为了使这个理论框架具有操作化的可能,我们也讨论了方法论问题,包括多层次综合运用等方式,鼓励在国际实践研究中采取多元的研究方法。在下文中,我们首先界定本书的核心概念——实践。

实 践

实践是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competent performances)。更加具体地说,实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这类行动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行动者的适当绩效,同时包含并展现背景知识和话语,并可能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这类行动在物质世界中发生,也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实践活动,比如划定边界、实施核威慑或是进行金融贸易等,并不仅仅是一个将结构与施动者或是将施动者与结构连接起来的描述性指向“箭头”,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物质和理念过程,这个过程使得结构趋于稳定或是发生变化,使得施动者能够重构或是改变结构。本章第二部分会讨论这种实践定义对社会理论产生的意义。在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讨论两个内容。第一,讨论行为(behavior)、行动(action)和实践(practice)三个概念的不同。第二,通过剖析实践主要的概念性成分,厘清实践这一概念。

在一般情况下,行为、行动和实践这些概念往往是通用的。但是,作为学术概念,它们并非同义词。认识这些概念差异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将它们视为一个逐层递进的结构:行动是具体的行为,实践则是特定类别的行动。¹³简言之,“行为”的概念反映了做事情(doing)的物质层面,是在物质世界中发生并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的举动。“行动”的概念加进了理念的层面,强调某种举动在主体和主体间层次上的意义。最后,“实践”的概

念则涉及这一结构的另外一个层面,实践是在有组织的社会性环境中具有规律的行动——通过强调这一特征将整个结构统合在一起。行为和行动的区别很容易厘清:行动是具有意义的行为。在大街上无目的地奔跑仅仅是一种行为,而在大街上奔跑着抓盗贼则是具有意义的行为,亦即行动。实践是有规律的行动,嵌于有组织的特定环境之中,因之被界定为特定的行动,是通过学习和训练而产生的行动。¹⁴行动总是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反之则非必然。行动是具体的,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而实践则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虽然也是发生在社会域境之中,但其发生却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比如,警察团队粉碎犯罪集团属于实践范畴,因为这种行动具有社会意义并会反复发生。再举一例,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但是,当这种行动发生在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性环境之中,超越时空局限反复出现,被理解为对潜在力量的使用,被宣称作为诸多社会行动复杂联动的组成部分,并可能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而习得时,它就不仅仅是一种行动,而是强制性外交这一实践的组成部分了。

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 practices)是指与广义世界政治相关的、通过社会组织的活动。国际关系学界有着诸多因为定义而产生的激烈辩论,比如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等等,我们这样界定本书的研究范畴,意味着不在这些辩论中选取某一种立场。相反,我们认为,重视国际实践所产生的重要认识论结果恰恰能使这些学理性辩论“回落”到世界政治的实际,以便根据经验事实认真分析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某种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产生了与世界政治相关的结果。换言之,我们的研究范畴本身,无论涵盖的是全球、国际、跨国、地区、组织、次国家,还是地方,也都是属于实践范畴的问题:什么属于国际实践范畴,什么不属于国际实践范畴,最好是由实践者在世界政治的实践活动中加以界定。

现在解析实践这一概念。第一,实践是行动的实施(performance)。¹⁵也就是说,实践是做事情的过程。实践不同于实体或是实在,实体或是实在是以具体形式存在的,而实践只存在于自身的展开或是过程之中。¹⁶实践活动与历史长河并行,并且构成了历史长河。实践作为行动的一种形式,不同于偏好或是信念,也不同于话语或是制度。实践表现

了前者,也使后者得以具体化。第二,实践往往是有规律的,因为实践一般展示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性。实践与常规活动有相似之处,也是反复发生,或至少是再现了具有同样意义的相似行为。上面谈到的这类规律是社会组织性域境的组成部分,不仅给予实践以意义,也会形成互动。当然,这不是说实践必然是严格意义上的机械重复,因为即便在重复性的实践之中,也总是会给施动者留有活动的余地。¹⁷但是,作为一般性的原则,重复性是实践的一个关键特征,也是实践的社会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第三,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社会意义并能够被社会所识别的适当绩效行动。实践的结构维度不仅来自重复性特征,也来自(且主要来自)一个事实,即由个人构成的群体往往根据相似的标准来诠释行动。¹⁸因此,社会识别是实践的一个根本特征。某种行动适当还是不当绝对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并且通过社会关系来加以识别认定的。行动实施的概念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识别和认定实践活动的公众或是听众。正如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所指出的那样,实践与习惯不同,习惯完全是个体层面的行动(也是被这样理解的),但实践则是社会层面的行动,它可以被认定是适当的或是不适当的,¹⁹而确定实践是否适当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不适当的实践可能比适当的实践更为“成功”,因为它能够带来某种结果。第四,实践依赖于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实践同时包含、展现了背景知识并使其具体化。知识像意图、信念等一样,是先于实践的。进而,主体间性是嵌于行动实施之中的,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加以表述。²⁰背景知识是实践性的;背景知识导向行动,正因为如此,它往往被视为技巧性知识,而不像诸如规范或是理念这类可明示的表象性知识。²¹

最后,实践将话语(discursive)世界和物质(material)世界编织在一起。如果没有语言、沟通和话语,人们是无法区别行为和实践的。语言传达意义,所以会将实践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枢纽和引擎。但语言不仅转达意义,语言自身就是以“话语实践”²²的形式展现行动或是做事情。从根本上讲,实践以具体的方式再现了世界:实践以含蓄的方式表明,实践就是“事物何以为此”的本源。²³同时,实践又受到物质性事实的影响。²⁴实践通常是在世界上发生的,又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所以,实践可以改变实

际的环境,也可以改变个人和群体的世界观。

举一个国际峰会实践的例子加以说明。八国集团是八国首脑的会议,由于它符合上面列出的五个要素,所以是一个国际实践活动。第一,八国峰会是行动的实施:是一系列真实的活动和过程的展现,从欢迎仪式,到联合新闻发布会,再到首脑集体合影。第二,这些行动的实施年复一年都是一样的,是有规律的。虽然每次会议都声称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整个活动的程序年年相似,包括排名顺序、正式和非正式讨论交替进行等等。第三,与会国官员在出席会议的时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适当的行为举止。比如,媒体和公众会很容易明白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随意开玩笑的镜头意味着什么。第四,多数行动的实施依赖于嵌于实践的背景知识。比如,各国官员会以具体且娴熟的方式将自己与正式公报所表现的一致基调稍稍拉开一点距离。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八国峰会既有观念性的一面,也有物质性的一面。与会者花费大量时间,公开或是私下谈论他们所举行的会议,以便表达其偏好或是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动用许多物质性资源,比如会议室、背景装饰、互联网、与主办方交换信息等等。

从概念上讲,任何特定的实践都可以在不同合成层面上加以理解。比如,国际峰会实践就是几个层面多种适当绩效行动的综合,包括正式宴会、新闻发布会、双边会议等等。我们认为,应当根据两个标准确定恰当的合成层面。第一,依照研究问题而定。如果需要研究国际峰会,那么,将八国集团峰会视为一个合成实践活动就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如果研究重点是政府间仪式性活动,那就需要聚焦稍低一点的层面。第二,行动的实际情况有助于确定最恰当的合成层面。仍以八国集团为例,如果与会官员将八国峰会作为一个整体来采取行动,那么,作为整体的八国峰会就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但是,主办方也可能会将非正式多边会议作为“采取行动的场所”,那么,非正式会议就会成为切入点。从方法论的视角看,切实可行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是研究国际实践的关键。

莱娜·汉森(Lene Hansen)在本书第十一章中区分了两类实践活动——具体实践和一般性实践²⁵,这促使我们思考实践合成(practice aggregation)与实践集(constellation of practices)的概念。在本章第四部分,我们会详细讨论实践集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森对于两类实

践的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具体实践往往会被看成是一般性实践。实际上,“毫无争议的具体‘日常’实践活动”,对于界定一般性实践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具体实践和一般性实践的区别要求我们审视重大的具体实践活动,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具体实践活动属于哪类一般性实践?若称某个具体实践活动属于一般性实践的范畴,那么,这样做的条件是否稳定?”²⁶比如,在八国峰会的例子里面,联合新闻发布会是一个具体实践,需要提出的重要问题是:这样一个具体实践活动在打造多边外交这种一般性实践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发布会程序变化是否表示多边外交的一般性规律会发生变化?

研究国际实践还需要面对团体实践(*corporate practices*)的问题,即实践活动是由群体一致实施的。在世界政治中,大多数实践属于这个类型,比如战争就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在不同程度上符合施动者权限,同时包含、展现了背景知识和背景话语,并使其具体化,在物质世界里发生,也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八国集团峰会不仅仅是参会的国家元首在实施行动,也是各国代表群体在实施行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必然嵌于实践的背景知识使得实践总是一种“集体活动”。²⁷因此,我们将团体实践解释为由实践共同体发动并实施的行动。由于背景知识在这些共同体成员中的扩散,就会促使他们采取相似的一致行动。例如,某国代表团会采取协调行动,通过不同层面(国家元首、主办方,政治顾问、专家团等)国家间的会谈,了解其他国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及其灵活程度。这样的团体实践不是一个团体施动者(国家)的行动,但却是一国代表团的集体行动。这个代表团的成员由于具有相似的背景知识,就会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域境中形成一种协动的关系。

构建国际关系学界跨越范式的对话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突出实践的,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主义”,而是为了服务于现有的各种“主义”。实践议程的合理性在于它可以作为国